■东鳞西爪

你也被挑逗性手机短信骚扰过吧

蒋玉磊 制图

◎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长夜寂寞难耐，孤独的我想要人来抚慰，座机拨XXXX1833我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XXXX0926听我从少女变成熟女的那夜！询XXXX1106”。这是笔者手机收到的短信之一。短短几句话，居然能串上三个电话号码，颇有广告特征。1927年12月17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刊登的鲁迅《小杂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见《而已集》）因此，声讯电话作撩拨业务宣传，只需稍作暗示。相比电视里那些大喊大叫、非常直白的产品广告，这些短信反而含蓄一些。当然，考虑到不同受众群体的差异，也有一些很露骨的广告。本文对此只能瞒如。

电信服务商对这些广告似乎眼开眼闭。笔者每天收到若干条具备广告某些特征的短信。其中，房产宣传是大头，理财产品、外国家教宣传也不时凑热闹。偶尔还会有一些私人侦探、走私水货、地下钱庄、代客复仇之类的准广告。笔者手机陈旧，容量有限。为此，每天必须删除这些准广告，以留出空间，接收我所需要的短信。但这也在客观上为新的准广告留出了空间。近日，笔者不胜麻烦，致电电信服务商，被告知：目前尚无垃圾短信屏蔽技术；但用户可以把垃圾短信转发给电信服务商，去投诉；用户转发垃圾短信给电信服务商，不收服务费。我恍然大悟：原来手机用户必须先替电信服务商无偿把关。至于何时才能免受准广告骚扰，则没有什么承诺。

电信服务商不设法去屏蔽准广告，也不意外。广告把关，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并且，经过把关，一些广告必然被“枪毙”，从而影响短信业务量。因此，这是一项增加成本、减少收益的工作。但电信服务商对短信平台内容不闻不问，也会受舆论指责。因此，设立投诉热线，欢迎举报垃圾短信，也算尽了绵薄之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所称的准广告，在电信服务商服务生口中，一概称为垃圾短信。

那么，什么是广告呢？《广告法》第二条给出的定义是：“本法所称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文字，我看就符合这个定义：服务提供者承担着短信发送的费用，通过手机媒介以短信形式直接介绍所提供的服务。那么，手机是否算媒介呢？从手机电视业务看，它与固定电视有共同的属性。并且，手机电视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做广告呢！因此，说手机是新兴媒介的一种物质载体应该没有什么疑义。至于垃圾短信，则没有官方的定义。当然，电信服务商不承认它是广告，也有理由；我没有按广告的标准收费么！不过，就客观效果而言，垃圾短信已经具备广告的效果。用户一般不会在收看内容的同时，同时关注电信服务商是否按广告标准收费。不少舆论把这样的短信，直接称为手机短信广告。

只承认手机中存在垃圾短信，避免与广告扯在一起，意味深长。《广告法》第三条规定：“广告应当真实、合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第七条规定：“广告内容应当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得“含有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段文字，好像就不大符合上述规定。如果承认它是广告，那岂不意味着电信服务商在为违法行为提供平台？如果只承认它是垃圾短信，那至多也就算格调低下的一段文字，倒也没有什么违法的嫌疑。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在本文中引用那段文字，《上海证券报》尚可以容忍；但付钱给《上海证券报》要求单独刊登，那是万万行不通的。

针对手机准广告，我们应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予以规范。1994年10月27日，《广告法》由八届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通过。当时，手机普及率不高，电信服务商的服务手段也较为单一。那时还没有短信业务。因此，《广告法》在例举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等媒体时，并没有涉及手机，甚至连互联网都没有提到。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正在增大，但对手机媒介的监管基本还是空白。笔者认为，短信平台属于私人空间，并不适合发布广告。这就像纸质广告不应该从居民家的门缝中塞入一样。手机中提供公共信息的平台，则可以发布广告。目前，电信服务商首先应考虑规范短信业务，重点监管群发短信业务。政府应禁止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发布准广告。

■心雨

光有网络还没法真正联通世界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比尔·盖茨早已是当今美国财富英雄的一个标竿。不过，很少人知道，虽然微软公司电脑软件终于成为连接全球人类的信使，在无远弗届的网络上自由奔腾，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比尔·盖茨感到满足。因为他内心有个真正的遗憾：他离开校园时，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中。

他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明白：虽然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IT行业正一路高歌，然而，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和创造，而是来自于消弭不平等的努力：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广泛的经济机会——消弭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目标和成就。

造物主赋予每个生命以同等价值，可现实中某些生命养尊处优，另一些生命却被无情弃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告说：在一些落后地区，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以及从未听说过的新型传染病，但是，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药剂，却无法能送到他们下垂的手中！

答案很简单，也颇无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拯救贫弱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那些感染了新型传染病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政治上无从发出声音，而无远弗届的网络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奢侈。

有人曾假设：如果比尔·盖茨不小心把1000美元掉在地上，从理论上说他不应该去捡，因为弯腰的4秒钟已经够他赚回1000美元。而现实生活中这个惜时如金的人，为了给那些绝望的人们传递救命的一美元药剂，却不惜一掷万金。他决定将个人财产的95%投入慈善事业，并计划提前到2008年退休，全身心从事义工。自股神巴菲特承诺加盟，盖茨基金会的资金总额已近700亿美元，成为全球之冠。

盖茨无意于炫耀和挥霍钱财，因为他明白，每个人的存在都被赋予特定的使命。他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有责任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使用它。

他同时认定，阻碍世界进步的，并非财富的差异，而是人心的距离。即便享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新闻直播的便利，但要让人们真正守望相助依然十分困难。每当灾难发生，地方官员总会召开会议，承诺调查，找出原因。可是如果他们敢于面对真相，就会发现：其实有99%的灾难是可以被预防的，可是这些灾难还是成千上万次地不断在各个角落发生。如果没有及时的披露，那么这些事件很容易被屏蔽；即使人们亲历或目睹了事件过程，恐怕也很难持续关注。因为世人的血液中少有帮助素不相识者的基因，那种无因之爱世人都很陌生。故此，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常转过脸去，那些曾使万千生灵涂炭的灾难，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忘却……

几年前，在瑞士曾召开全球健康论坛，议题与拯救几百万条生命相关。令与会的比尔·盖茨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论坛乏味之至，甚至无法听下去……，之前微软刚发布了某个软件的最新版本，令全球网民欢呼雀跃，而网民们高涨的热情与这个缺乏呼应的健康论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为什么人们不会为能够拯救几百万生命而激动喜悦？盖茨的结论是，除非你能够让大家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使他人激动。

的确，行动是最好的宣言。如果我们能努力建构起更为人性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如果现有的市场规则，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公平获利，至少能保障起码的生活；如果所有纳税人的钱，都被规范地用于符合纳税人利益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助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就找到了消弭不平等状态的有效途径。

今天，低成本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距离，信息交换的速度空前加快。可迄今为止，全球每六个人中只有一人有条件上网，大多数富于创造的人们，仍无法获得高科技的帮助，将他们的天赋、想法和苦难与世界分享。

但盖茨和微软的创造，终究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将人类的同情心传递到更远的边界，去终结那些极端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它还极大地强加了怀有共同理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去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千古难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盖茨的母亲生前曾不断督促他要为别人做更多的事：“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世界对他们的期待也更多。”

盖茨不仅身体力行，也曾与世界各地的学生共勉：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富有智慧、过着优裕生活的哈佛学生，是否从那些最穷困的人身上学到了些东西？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这些问题并非考卷上的答题，必须用行动来回答。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过：“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无论理性多么强大，我们依然生活在不确定之中，而惟一能够战胜这种不确定的，绝非高深精妙的理论，而是人类平等合一的信念和行动。

对此，盖茨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光有网络还不行，惟有爱，才能让世界实现真正的连接。

■红兵说话

书，不该住在私人家里

◎葛红兵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有个朋友来我家，见我书房的书明显减少了，原来有24架，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满满的，现在少了很多。哪里去了呢？捐赠出去了。现在，我每个季度都不断地捐，我还要继续捐赠下去。

朋友问，“我写的书，送给你的，你捐了么？”我说，“也捐了！”她很生气，认为我看不起她的书，没有藏好她的书。其实，她的想法是何其地错误呢。一本书，赠给我个人，放在我个人的书房里，只是我一个人看，但是，赠给图书馆，给那些孩子们看，它会得到更专业的管理维护，会得更多的读者，也许是一百个，也许是两百个，很可能还更多。

想想从前那些私人藏书家的故事吧。旧时江浙有很多极富盛名的藏书大家，他们一生万金散尽，到处收书，集书，藏书，可是到最后还不是流失了？能完整保持下来的，几乎没有。在我看来，他们把书收到家里秘藏，非但没有保护好那些书，反而是让那些书明珠暗投了——明里是爱书，实际上是封锁了书，让书坐了牢。一本书见不到读者，就犹如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坐了牢房啊。

想起少时无书可读，到处借书的事情，我就觉得，书住在私人家里，实在就如同一个爱好旅行的人，收起了行囊，放弃了车票，过起了定居生活一样。一个旅行者要永远行走在路上才好，一本书也要永远在不同的读者手里流转才好。

关于书的事情，我最近想了很多，有些书对我来说来得不易。比如那套《鲁迅全集》是当年我在海门苦闷彷徨无地容身之时，刘延池老先生垫资，帮我从海门新华书店淘来的。当时，初买的时候缺两卷，刘先生以接近70的高龄，一个人拎着那么重一捆书，跑三里多路，给我送书来，这份深情，怎么能忘呢？刘先生已经过世，此书，已是我和他唯一的联系。我的书橱里有很多的签名本，高行健的签名本，贾平凹的签名本，我的导师曾华鹏先生的签名本，我的朋友邓一光、张执浩等等，还有很多青年作者的签名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很珍贵的。

其实，占有书，和拥有知识并没有什么对应的关系，占有书，更和拥有对知识的渴求没有关系。更进一步说，占有书，和拥有属灵的生活也没有关系。让书去旅行，去它的美地——更多读者那里，这才是对书的尊重。

我还会不断买书，集书，然后不断地捐赠。这样做，有属灵的美意。

■斜阳芳草

消失了的银行家时代

◎丁骋骋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副教授

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清朝末年是外资银行和官办银行垄断为主，那么民国之后可以说就是私人民营银行唱主角的时代。这些银行虽然资本与官办银行不能相提并论，但数量极其庞大，仅1915至1921年，全国新设立民营银行就达124家。这些银行往往经营灵活、管理得法，为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民营银行中最有名的就是“南三行”和“北四行”。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金城银行又是其中的台柱，堪称一时之瑜亮。

民营银行兴起，随之形成了一大批银行家。这群杰出人物的代表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李铭、浙江兴业银行叶揆初、盐业银行吴鼎昌、中南银行胡笔江、大陆银行谈荔孙、四明银行虞洽卿等。当然官办银行中也不乏新老才俊，如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宋汉章和贝祖诒，交通银行的钱新之、胡祖同等等，可谓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真是一个银行家的时代！

时事造英雄，但历史也不是在偶然间塑造出这么一批人物。仔细推敲这些银行家的背景，他们大多出自江浙一带，受过良好高等教育，虽然身为银行家，与政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更重要的，当时闻名全国的“江浙财团”正是以这批银行家为核心，形成了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商帮。

无论是以北京、天津为阵地的北四行，还是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南三行，其核心层大多为江浙人氏。如陈光甫为江苏镇江籍，周作民为江苏淮安籍，李铭为浙江绍兴人，叶揆初为浙江杭州人，吴鼎昌为浙江吴兴人，徐新六为浙江余杭人，虞洽卿为浙江慈溪人，张嘉璈为江苏嘉定籍。个中原因，笔者以为，清末北方钱业大多在晋商控制下，由于因循守旧，丧失了将旧式金融机构改造为现代化银行的机会，因此曾经称雄一时的商业巨子随着票号、钱庄一起迅速被历史湮没。而江浙得风气之先，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金融中心当然最先成长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金融巨子。

这批金融才俊有的曾留学海外，其中留学日本最多。如李铭入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学习银行学，吴鼎昌、谈荔孙就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银行经济，周作民求学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还有的留学欧美，如陈光甫获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商学学士，王志莘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徐新六获英国维多利亚大学商学硕士。他们带着当时先进的金融知识投身中国银行界，积极倡导和实践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

在旧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民族资本家想要独善其身，不过问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民营银行在成立之时，都有大量官僚政客参股，银行核心层与政界的关系往往也是剪不断、理还乱。比如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曾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而上海储蓄商业银行的陈光甫，也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靠着这种与政治的天然关系，民营银行才获得空前发展机会，渐渐地形成了“江浙财团”这样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具有相当资金实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家群体。大名鼎鼎的虞洽卿就是这个财团的台柱。而张嘉璈、陈光甫、李铭三人则是核心人物，人称“三鼎甲”。早期经济学家杨端六在《银行周报》撰文称：“经济事业不能离政治而独立……今日之银行家，为保全自己的财产计，为维持社会之秩序计，均负有政治上的重大之责任”。与政治的联合，表面上说是银行家的“责任”，说到底是为了他们所代表的资本的实际利益。民营银行靠着与政治的联姻获得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深受当局的盘剥和压榨。所以银行家对政府抱着一种既爱又恨的心理，对待革命的态度往往也是首鼠两端。

1949年之后的30年，人民银行一统天下，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不复存在。这些银行家群体也作鸟兽散，纷纷移居海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到了香港，也有的移居欧美。而那些曾经璀璨一时的民营银行也大多迁至港台，虽保留了原有名称，但往日风采无法再现，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

在金融业生机勃发、资本市场日益壮大的今天，国人在期待着另一个人才辈出的“银行家时代”，也许这样一个时代早一点就应该到来。

■彼岸

一个手包设计师的环保理念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上个月，我去了一趟纽约，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遇到了纽约一家颇有名气的设计公司一位设计手包的女士。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是从不用手包的男人，根本不懂手包设计，可是我惊奇地发现，与手包设计师的一席谈话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比如，为什么现在流行个大的手包？因为包大就显得人瘦，当今流行瘦身，当然大一些的手包就更受欢迎。还有，为什么现在开始流行布质料的手包？因为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的意识，皮质料的包会给环境增加负担，也不利于动物保护。

我不由对手包设计师增添了几分敬意，原来手包设计并非只考虑漂亮，更要考虑环境保护那样的理念。

大包显得人瘦应该是常识，但对于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与手包设计的理念，我却认为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坦白地讲，我不是个时髦的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主义者，我甚至有些反感环境和动物至上的理念。美国有一个动物保护协会，他们极端到谴责人们吃烤鸡，他们把在烤箱里烤鸡与当年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相比。还有，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把全球变暖主要归咎于人类，按他的推论，几乎是强迫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强迫社会放弃经济增长。

虽然我反对那些极端的环境和动物保护主义者，但我愿意做一名自然资源的保护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去节约资源，比如，要把可以回收的垃圾单独分出来，出外住饭店时少用浴巾等。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有别于极端环境保护主义者，我并非要谴责那些要买皮质手包的消费者，我相信每个人有其消费选择的爱好和权利。其实，从布质料手包流行的现象来看，众多的消费者已经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这是值得高兴的和提倡的事情。同样，我尊重那些人选择油电混用的汽车，但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也别在道德上指责我开SUV。

当今时代，环境保护不仅上升到道德的高地，而且已成了政府的大事之一。一些人特别强调政府在环保上的作用，而另一边则强调通过市场的作用去保护环境。我不否定政府在环境保护上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严格执行环保的法律，但如果政府行为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却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市场行为应该是更好、更全面的方案。比如美国国会最近立法规定，再次降低汽车油耗量，旨在减少汽油用量，从而保护环境。那当然是一个好的动机，但那些政客们忘了，低油耗的立法会无形中带来两大危害，一是汽车厂为降低油耗而在汽车材料上做文章，其结果会是降低汽车的安全性；二是汽车厂会提高汽车销售价，从而使更多的人买不起新车，只好转向购买旧车或继续开旧车，可是旧车对环境更加不利。其实，在当前油价高企的情况下，汽车公司愿意通过技术更新去降低汽车的油耗，从而去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此外，汽车公司也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多生产小型车，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环保责任心去自主决定，选择大车还是小车。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市场机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环保这样的事情却更需要政府的管制，因为市场机制不管环境保护。我以为这是对市场机制的误解，市场机制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也能在环境和资源保护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低能耗的产品，那就是公司去开发低能产品比如汽车的最大动力，公司需要市场份额，更需要产品带来的利润。在替代能源的研究上，政府过多的投入会有更多的浪费，而公司的研发却最终能够发现成本更低、对环境更有利的替代能源，因为那样的研发能给公司带来市场份额和利润，由于是商业机构的投入，当然在资金上的使用上就更为有效。

毋须置疑，当今世界需要加强环保，但过多政府管制与道德谴责是感觉良好却并无实效的做法，建立个人自愿保护资源的意识，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